

猛醒的时刻

——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纪念专集

于光远 胡绩伟 等著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编 者 的 话

值得特别纪念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十周年了。这次全会，及其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会后的理论务虚会议，对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扭转危局、开创改革局面，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同时也就结束了党内外民主被严重破坏的困境，开辟了我国民主发展的新局面。每提起这段宝贵的历史，很多身经其事的同志都很激动，回忆绵绵，感想联翩。本书汇集的二十篇文章，就是其中一些同志为十周年纪念专门写出的。文章的题目、内容、体裁，都是作者自定的，我们完全尊重作者的自我表达。我们只是将这些文章负责汇集成册，取了《猛醒的时刻》这一书名，把它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外文化出版公司的大力支持。本书的编辑工作是由常大林、冯媛同志承担的。在此特向各位作者和协助者致以衷心的感谢。欢迎读者对本书批评指正。

于光远 胡绩伟

1988、10、2、

《民主研究丛书》缘起

胡 绩 伟

创立民主理论，推进民主政治，是我们多年的宿愿。

改革和完善中国的民主制度，并使之正常运作；阐释和深化民主理论，并使之成为更多人们的共识，是中国民主建设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

正如十三大报告指出的，“当前，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状况，同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相比，是很不相称的。改革开放已进行多年，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仍然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而在民主理论方面，这种落后的情况则更为突出。

多年的实践表明：民主的理论和实践落后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对民主的要求，这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项事业进退反复、步履为艰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改革开放的现实急迫地呼唤民主理论的尽快诞生，民主实践的大步推进。《民主研究丛书》愿为此聊尽绵薄之力。

当然，我们研究民主理论的目的，决非要再造出什么定于一尊的信条或体系，而是要在不同观点和不同理论体系的创立、研究和比较中，逐渐形成对民主的某种共识。

因此，《民主研究丛书》不迴避、掩饰不同观点的表达和争论；相反，我们拟在推进中国民主的共同目标下，在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的范围内，出版各种不同理论观点和构架、不同实践设想、不同内容和叙述角度的优秀著作，使研究者得以将一家之言自由充分地表达出来；也使读者有机会较全面、系统地了解中国民主研究的内容和现状。

民主研究并不仅限于纯理论的论述。有关中国民主建设的历史和现状的切实记叙和评论，对于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推进和深化人们对民主的认识，同样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本丛书所编入的著作，不限于理论专著，内容、体裁尽可不拘一格。

我邀请于浩成、王若水和李洪林为本丛书副主编，还邀请一些在民主理论研究上有较深造诣的中青年同志作编委，努力把这套丛书编好。

《民主研究丛书》已经得到许多同志的支持和赐稿。在此，特向这些同志，向中外文化出版公司表示衷心感谢！热切希望专家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继续惠赐佳稿，希望广大读者多多批评指教。

一九八八年九月

《民主研究丛书》

主 编

胡 绩 伟

副主编

于浩成 王若水 李洪林

目 录

于光远	伟大的发端 ——纪念我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开始 十周年.....	1
于浩成	理论探索的十年.....	17
马沛文	从路线的大转折到理论的大突破 ——回顾十年前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 会.....	32
王若水	中国需要新的启蒙.....	71
王贵秀	民主政治建设刻不容缓.....	77
王惠德	医治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顽症.....	89
冯兰瑞	《阶段》风波的启示.....	97
阮 铭	论新启蒙.....	105
李洪林	中国思想界的转折.....	144
苏绍智	揭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新的一页.....	167
杨西光	解放思想 自由探索 发展理论.....	186
吴 江	论党风.....	193
吴 象	从昔阳到风阳.....	209
汪子嵩	实践和理论.....	217

周修强	解放思想的道路不平坦 ——《理论与实际》引起的一场风波	223
张显扬	再论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点	231
胡绩伟	听话，不听话？ ——回忆党报改革探索的一段历史...	246
郭罗基	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	279
曾彦修	我们终于从教条主义与僵化“模式” 中跳出来了.....	292
廖盖隆	改革成功的保证在于民主.....	299

伟大的发端

——纪念我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开始十周年

于 光 远

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在这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胜利闭幕，把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划分为两个阶段。在这两个会议之前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始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点，是客观的历史已经基本上走出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转变时期”相适应的，就是实行无产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但是在主观指导思想上仍沿用这“转变时期”或“过渡时期”的那一套路线政策。在这两个会议之后的，就是以推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二阶段，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阶段。

这两个会议，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这一伟大历史运动的发端。

这两个会议之所以成为改革的伟大发端，是由我国历史具体进程决定的：如果我国不是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

了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如果我国不是从1957年到1978年这长达二十二年的时间中在路线上犯有严重的错误,如果我国未曾经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我国经济建设能够顺利发展而非长期停滞不前,如果我国人民不最后起来进行“四五”运动那样的斗争,导致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如果不是邓小平、陈云等在党内有崇高威信的革命家已经参加党中央工作和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负责干部得到“解放”,使中央会议的成份有了重大的变化,如果没有这一切,这场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是不会以这两个会议为发端开始的。

应该说这两个会议之所以开得如此成功,是由我国五十年代下半期到一九七八年的具体历史进程决定的。它们开成了一个回顾和总结以前二十多年历史经验教训的会议。这种回顾和总结得出的结论,归到一点,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①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就是这样来论述在我国进行这一场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

应该指出,这两个会议不但从原则上和理论上一般地指出进行这一场改革的必要性,而且还较为具体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这就是:要坚决改变在建国后基本上从苏联搬来的那一套僵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

^① 《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写道：“会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①这也是回顾和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之后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发端于这两次会议的这一场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不是我国一国孤立的现象。当今世界上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体制改革的问题。这场改革的发生，是有深刻的世界历史原因的。当今一切社会主义国家中，在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时，人们只知道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其基本制度是怎样的。没有也不可能知道在革命胜利之后究竟应该建立起怎样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即社会主义体制），才最能与本国的生产力的水平相适应，最能促进本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体制，只能是在革命中自然形成的体制。这样的体制不能够很好地适应各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各国最后不得不普遍要求进行一场改革，实现从这样的体制向凭藉较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设计出来的新的体制转化。

就是在开始改革的时间问题上，也存在深刻的世界历

① 《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史的原因。我国的改革是发端于1978年底的这两次会议。别的国家的改革,有的比我国要早一些,有的和我国基本上同时,有的比我国要迟一些,还有的现在也许还没有开始。世界上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同时进行这样一场改革,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样的改革,不可能普遍地发生在五十年代初或者更早的时间。那时候,整个世界处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处在困难时期,而社会主义社会有一种蓬勃发展的势头,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自我感觉很良好。在那样的形势下,尽管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出社会主义各国的现行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认为有对之改革的必要,但是改革还是不可能列上社会主义各国的议事日程的。因为在那时候,人们不会象现在那样地认识到进行这场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不会象现在那样地认识社会主义的光辉前景依靠的就是取得这场改革的胜利。而到五十年代中期之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走出了战争和革命年代的困难时期,而进入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相对稳定的时期,在这之后,资本主义社会有了相当快的发展。而在同一个历史时期,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却在指导思想上离开了本质上是必须不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而把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甚至某些曲解奉为教条,思想上僵化,政治上极“左”,在组织上压制党内有不同看法的人,甚至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结果使社会主义的力量受到很大的损失,经济建设的发展缓慢。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在这样的世界和社会主义内部的形势下,人们对必须进行一场社会主义

改革的觉悟就大大提高，改革于是就成为社会主义世界普遍的潮流。

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以改革的伟大发端载入史册的。但是人们会注意到在会议中讨论到的问题是很广泛的。在会议上还讨论了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讨论了如何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政治问题（如对被诬蔑为反革命事件的“天安门事件”进行平反的问题）；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讨论了农业方针问题等等。尤其突出的是，这两个会议把讨论恢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思路，作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这一讨论的中心思想是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所谓“两个凡是”。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又重申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两个凡是”的观点，如果不反对掉，那么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起始阶段——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就不能克服，而改革也就根本无从谈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起始阶段中使我国遭受严重损害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因此在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和学术界要求在理论上澄清这个问题，纠正这种错误思想。于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半年多之前，即1978年5月，就从《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开始，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的宗旨就是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原理，使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获得理论上的科学根据。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两次会议中最重要的文件。《邓小平文选》的编者在对这个讲话所作的题解中写道：“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这个讲话中着重提出了“解放思想”的问题，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的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①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鲜明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实行改革的必要的前提。对两个会议前进行的那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也是从解放思想的角度给以高度评价的。他说道：“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

①《邓小平文选》（1976年—1982年）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31页。

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①

十年来的历史进程，就是解放思想与社会主义改革相并进行的过程。改革需要解放思想为自己开辟道路，同时改革的不断向前又令人们觉悟到解放思想的必要和为解放思想提供新的经验资料。新思维的产生，是从历史的新发展中来的，同时没有新思维，历史就不可能有新发展，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基本的命题。这个命题在今天的改革中，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解放思想这个口号开始提出来的时候，是针对在这两次会议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某些人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禁锢圈内，用许许多多条条框框来反对从实际出发提出的正确主张这样的事。这是主要的。另一方面，解放思想这个口号开始提出来时也是针对那时候在干部当中存在着的“看来头”，“看风向”，“随风倒”这样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而且认为这么做是正确的，不这么做就是抗拒。至于习惯于上级怎么讲自己就怎么想，根本说不上独立思考的现象，就更加普遍了。这两方面的现象在我们国家一直有，但是在那些年特别严重，特别显著，而且在那时有特定的具体内容。针对着的东西有特定的具体内容，当时的解放思想也就有具体的内容。但是大家也都明白，解放思想的意义是长久的和深远的，它针对的具体内容是会因地因时有所变化的。在这个口号提出之

① 《邓小平文选》（1976年—1982年）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33页

后，我国的改革向前发展了。改革的发展会遇到各式各样僵化思想的阻碍，也就会有针对性地对解放思想提出新的要求。当然解放思想未必很顺利。有时解放思想的倾向占优势，有时对解放思想怀疑和抵触的倾向占优势；有时解放思想的路子走得正，有时解放思想的路子走得不那么正，解放思想的历史也是曲曲折折地前进。应该承认，历史的规律是不会走直线的，不曲折就不可能前进。但是历史总是在前进。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理论务虚会以来，我国解放思想的历史前进得非常之快。从一般的解放思想发展到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这种再认识不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中间，就是在一般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解放思想的内容都扩展到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十年来在“解放思想”的号召下，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努力下，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上所取得的成就，对于推行我国的改革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有一些人们都熟悉的重要的论述，有时再来引用，可以起到温故知新的作用。在这里我想引用一段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报告上的一长段话（并在括号内作一些注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包括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这是在三中全会上得到充分肯定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开始提出‘初级阶段’这个概念。在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了初级阶段具有‘物质文明还不发达’的这个基本特征。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对这个概念开始有比较具体的论述，并用它来纠正在思想问题上、道德问题上的‘左’的思想。而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得到了系统的发挥，提到使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具有理论根据的高度〕；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接见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命题。在十三大报告中则更进一步提出了‘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这样一个‘生产力标准’的概念〕；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肯定这样一个观点是1984年召开的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上所作出的一个伟大贡献。它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这样一种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再是商品经济，可以不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来制定计划，不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看成内在统一的东西等等。它为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一个新的概念〕；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在改革开放上始终存在较为保守和较为激进的两种倾向，因此需要用这样的观点来说服对改革开放的怀疑和动

摇】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 [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讲话中就提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这是针对建国以来我们重视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作出的论断。在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强调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立民主政治’。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了决议】；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互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 [这个观点是十三大报告特别强调的】；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国家统一的观点 [这是1983年邓小平提出的、非常重要的、创造性的观点，它对于实现国家统一正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党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等等”。

这十二个观点是十三大报告作出的概括，比较全面，但也还只是最重要的。从这个概括中可以看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的几年中，由于解放思想，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这个课题上，我们取得了何等巨大的成就。

在十三大后，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再认识又提出了更深一个层次的问题。人们认为必须更深一个层